



为源文史资料

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翁源县委员会
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

翁源文史资料

第 10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翁源县委员会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

1997年7月

目 录

(一)

- 许仁峰先生支援革命事略……………江祖仰(1)
忆在六里联保的革命活动经过……………涂梦岐(5)
怀念李醉园先生……………黄育辉 杨永鹏(12)
广东抗日先锋队在翁中……………张肇周(17)
忆革命烈士沈树昌同志……………沈瑞华(18)
怀念肖亚彬老人……………官世圭(20)
母校尚中革命活动二三事……………袁德礼(23)

(二)

- 翁源县封建土地制度和土地改革的概况 ……
……………丘 霜 王志锋(25)
翁源土改歌三首 …… 黄宝金 供稿(29)
我县土改工作概述……………杨永鹏(32)
忆赵广生同志……………刘文江(43)
翁源县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记略
……………刘林洲(46)
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记实…张 铁(49)
翁源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王志锋(52)

(三)

- 民国时期翁源部分区、镇经济概况
..... 陈新桥 杨永琪 供稿 (59)
回忆四十年代的纸币 谢其明 (63)
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在官渡的血腥罪行
..... 吴富锡 刘致金 刘致沂 搜集
..... 涂梦岐 涂招 整理 (65)

(四)

- 解放初期我县的社会状况
..... 何藻修 曾永谦 黄应仕 (67)
新教育的开始——解放初在翁源县立一中
..... 许宝东 (71)
解放初期我县教师队伍的精神面貌
..... 谢其明 (76)
五一年我难忘的两件事 许宝东 (82)
翁源县的电力事业飞跃发展 王志锋 (85)
翁源县金融业的发展历程 龙文豪 (89)
翁源县气象简史 刘定忠 (96)
翁源县信访工作概述 刘玉森 (100)
翁源县林业发展梗概 陈策书 (107)
翁源县陆路交通的沿革和前景 张振麟 (112)

我县手工业发展概况	李定球(116)
我县慈善事业概述	刘金阳 官淑娟(121)
记我县民间企业家陈其营 ...	曾永谦 黄应仕(126)

(五)

滢江水运最险处——神前滩	官世圭 <u>余善杰</u> (128)
官渡沧桑漫笔	吴富锡 刘致金 刘致沂 搜集 涂梦岐 涂招 整理(129)
狮渡街忆述	吴富锡 刘致金 刘致沂 搜集 涂梦岐 涂招 整理(136)
翁大公路对我县经济的影响	张肇周(140)
翁源历史名人简介	陈新桥(141)
翁源历代文人的著述	<u>林年一</u> (144)
民国时期翁源县学生联合会诗词雅集	甘儒宗 供稿(146)
鸣谢	本刊

许仁峰先生支援革命事略

江祖仰

许仁峰先生是翁源周陂镇阳西村寺背楼人，在土改时被误杀，含冤三十余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1988年12月15日县人民法院在周陂阳西召开群众大会，郑重宣告“许仁峰原以恶霸罪处以死刑属错杀。据此，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及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特改判如下：①撤销1952年8月北江专署批准许仁峰死刑的批复；②改判许仁峰无罪”。许先生获得平反昭雪，其全家老少莫不感激万分！现对许仁峰先生支援革命的往事概忆数端如下：

一、许仁峰先生1930年跟其父许长瑞来到韶关市西河（现惠民路10号中国工商银行的位置）买下一亩多的荒地，筹建了一座“长兴楼”，当地人惯称为“四角楼”。1931年间其父病逝，当时该楼尚未竣工，他便与其大哥许情峰一道，继续设法完成此业，随后便领其在周陂老家的家眷一起迁往该处定居。

抗战时广州沦陷后，韶关为战时省会。当时我县不少有识之士和爱国青年学生，前往韶关寻找工作和进入学校读书深造，他们往往去许仁峰先生家里寻求解决膳宿的困难，如革命老干部、中共地下党员林卧龙、陈宜景、涂夫等同志以及杨玉辉先生等均先后在他家里住宿过并受到热情招待。尤其是涂夫同志在1945年冬还与许碧同志（许仁峰的儿子，当时北江支队游击队员）在其家中隐蔽，进行革命联络

活动，许仁峰先生多方面给予方便和支持，使革命工作顺利进行。

二、从1941年开始，梁泗源同志（中共党员、曾任新丰县地下县委书记）一连四年经常在许仁峰先生家里膳宿，并利用“四角楼”地僻人稀便于隐蔽的条件，积极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当时，有新丰的地下革命同志来来往往，联系工作。日子久了，梁泗源同志虽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但是从梁泗源同志的言行来看，许先生的家庭成员已完全觉察梁泗源同志是地下革命工作者。难能可贵的是，当时许仁峰先生认定梁泗源同志是一个好人，他心目中认为梁为人诚恳、正派，平日又能尊老爱幼，对人彬彬有礼，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好青年，故不准其家庭成员对梁有半点非议的言行出现。在当时的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许家掩护了梁的革命活动，梁也熟悉许的内在心理，故进一步与许先生攀亲结友，和睦相处，从而安心利用“四角楼”开展地下工作。

三、1941年下半年，许展棠同志（中共地下党员）介绍一位外地人士樊耀辉前来周陂小学任教导主任（后来获悉此人也是中共地下党员）。那时，许仁峰先生的儿子许福来（即许碧同志）也在该校读书。许福来由于勤奋好学，颇得樊耀辉的喜爱。有一次，许仁峰先生得知樊主任在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的夜里，仅靠两张又旧又薄的尼毡当被御寒时，便即抽出家里的一张棉胎叫其子送给樊主任御寒度冬，樊主任为此甚为感激。1942年下半年，樊主任转教三华中心小学，不久，樊又决定辞职赴韶关另找工作。当时，他去韶关“四角楼”找见许仁峰先生，不但得到热情招待，而且还得到许仁峰先生的资助去与友人联系。后来樊很快就转到“挺二纵队”工作了（当时，“挺二”是属于我党掌握的一

支打着国民党旗号的部队)。经一段时间后，樊又再行转到广西省平乐县师范学校任教导主任（此时樊改名陈峰），继续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据说这间学校也是我党掌握、进行培养干部的一间学校。

四、1943年以来，梁泗源同志的交通员——梁小良同志（解放后任新丰县首届组织部长），经常到许仁峰先生在翁源周陂老圩马角街老家恒安栈，取梁泗源同志寄来的信件送往新丰游击区（都是一些代号情报和指导工作的文件）。许仁峰先生心里明白，那些书信是不平常的信件，但他却从不私自打听、干预或阻挠，因而使我地下党的情报传递一直畅通无阻，从未出现什么问题。可以说，当时许仁峰先生的店里，简直就是我地下党的一个交通站。

五、1946年冬，梁泗源同志前往中共香港分局，汇报东纵北撤后梁与战友们坚持在新丰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分局为了加强党对新丰开展武装斗争的领导力量，派章平同志及其爱人叶一萍同志，一起与梁泗源同志同返新丰，继续大力开展武装斗争工作。梁等一行为了安全起见，他们第一站先到韶关“四角楼”许仁峰先生家里，不料，被一些坚持反动政见的人员发现。后来，幸得许仁峰先生有关亲属多方掩护，才转危为安。几天以后，梁泗源同志等从韶关再行返抵翁源周陂时，住宿在许仁峰先生老家恒安栈。章平同志夫妇则到许时威店里投宿，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周陂许时威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那时适逢许仁峰先生在周陂老家的第二儿子筹备婚事，为了保证梁泗源同志等一行的安全起见，仁峰先生即与其长子许伯棠进行商议，由许伯棠将梁泗源、章平等同志带出周陂圩外，沿莲江坝这一近河小道，护送到他第三儿子许碧同志在昆山的教学地点，然后，再由许碧同志将梁、章

等同志护送到砾头地方的游击老区去，确保了梁泗源等同志一路顺风到达预定的目的地。

六、1948年下半年，许仁峰先生再一次从韶关返回翁源周陂老家，此时，凑巧在翁南地方由许展棠同志领导的游击队进行募捐粮草。许仁峰先生不顾当地反动政警机关的威胁和恫吓，毅然主动地为游击队捐献了1000多斤稻谷，因而也带动了其他殷实户踊跃为游击队捐粮，有力地支援了革命。

1949年的秋冬，粤北地区全面解放之后，梁泗源同志在一次前往韶关参加北江高干会议时，为了不忘许仁峰先生在白色恐怖之下，冒着巨大风险，为地下革命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和支援的难能可贵精神，特专程前去“四角楼”看望许仁峰先生全家老少，诚恳地表示对他老人家的关怀和谢意。当时，许仁峰先生表示：要永远做一个有益于革命的人。他还鼓励儿女和亲友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为国家、为人民积极工作。

回忆往事，我深感许仁峰先生那种不怕风险、乐于助人、支援革命的精神，确实是值得后人敬仰不忘的！

附注：我写这篇回忆录荷蒙许多老首长和老同志的帮助，提供了不少真实的情况，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忆在六里联保的革命活动经过

(1947·6—1948·3)

涂梦岐

六里联保就是六里圩附近的十一保、十二保、十三保（注）联合起来的办事处，是国民党统治时最基层的行政机关。它的全称叫“利龙乡六里联保办事处”，它的前身是“翁源县第七区局（署）”。在解放以前，这里向来是六里的“小衙门”。我在童年时候，就知道群众有什么纠纷都到这里来“投局”或“禀局”。群众对它是畏而远之、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六里联保，设在六里圩内的“关庭”里面。这间“关庭”，是庙宇式的建筑。檐唇镶有绿色的琉璃瓦，屋脊上用琉璃瓦安装了两条绿色的长龙，两条龙头对称地朝向屋脊中间那个橙黄色的葫芦。像“双龙夺珠”。大堂的正中有神龛，内有关老爷（关公）的木偶神像，故称“关庭”；堂前有一方形天花井，用红麻石板镶嵌了四边；两旁的走廊可通向四间房子。男监狱设在正门南侧；神龛底下是面积不足两平方米、且人在其间站不起身子的女囚房。此外，面向神龛的右侧，有一曲尺型狭巷进入后院，还有一栋有楼棚的瓦房。其中有一间是四间归厅，这就是联保办事处调解民事纠纷的公堂。

联保这个小机关，向来只有一二个保丁，没有什么武装

组织。1947年的上半年，由于翁源的地方游击队比较活跃——在较偏僻的农村进行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阻挠游击队的革命活动，不断地扩充反革命实力：三月间，利龙乡公所成立了治安队，有队兵30多个；接着又命令六里联保征收民枪，于四五月间也组织了自卫队。此后，联保的大门不但有队兵站岗，连门口约有40平方米的门坪（铺了砂灰的）也用铁丝网围起来了。

我就在这种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条件下，于1947年6月受地下党的委派，接任六里联保的首席保长。保长这个职务，当时的人们称之为“火（祸）钵”。在此之前，为了躲避端这个“火钵”——任保长而逃跑的有：六里圩的钟初舜逃跑到佛山；李被芬也逃跑到广州。李刚（东园）同志（地下党员）对我说：为了有利于革命，就是“火钵”也要端，何况你具有特定的条件……况且本地的反动派恐怕不敢惹你。”言下之意，就是我有社会背景：我有外祖父许康梅（当时是省参议员，1947年11月间被选为国大代表）做后盾。

我第一次踏入联保的铁丝网门，被门卫喝一声：“进来做什么？”从这天起，我为了革命的利益，没有去考虑个人的得失、安危，接任了国民党六里联保第六任保长。

六里联保，是在抗日战争中期（40年代初）开始成立的。前后的首席保长依次是：涂宗周、钟初舜、杨玉波、涂昆仁、张晋卿、涂梦岐、涂寿梅（任职到解放）。

我任六里首席保长时的人员有：驻联保的保长：十一保王济先，十二保李欣成（李平），十三保涂梦岐；自卫队：队长袁长安，班长涂周（钦周），还记得姓名的队兵有：涂罗养、涂石龙、刘应东等；另有队兵的炊事员涂心敏，联保的

炊事员涂文权，一共不过十五人。

前面说过，我任保长是地下党组织决定的。当时地下党的术语，叫“打进去”。所谓“打进去”，不是这么简单，没有特定的条件是打不入的。就是打入去了，要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把革命工作做好，不但要时时提高警惕，而且要斗智、斗勇、机敏、果断。总括一句，胆大心细，智圆行方，才能够应付千变万化的情况。否则，自己的生命很危险，对革命事业也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在表面上的工作，我是应付国民党的政令和调解民事纠纷；至于革命工作，主要是与李刚同志保持单线联系。他是我的地下组织的关系人（那时我的组织关系已由涂锡鹏同志转交他负责），又是我读高中时同班共桌的同学。所以他经常来联保，在社会、政治上协调的，不会惹人注目。除此之外，我还主动做了如下的实际工作：

一、张贴游击队的布告。我接任保长不久，组织上叫我在六里附近张贴游击队的标语、布告之类的宣传文告。当时因为六里圩有五头圩门，晚上都由联保的队兵上了内锁，而我又还没有培养到可以相信的队兵。所以我便通过读高、初中时的同班同学郭铭湘协助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两人由他的店铺后门摸黑出去圩外周围张贴共产党的宣传文告，特别在公路沿线的墙壁、圩门扇上贴的较多。

二、以经济和武器支援游击队。我接任保长一个月后，在我村下围（现在龙船下围）片，党组织了一支命名为青龙队的游击队。队长涂利培，政治委员许展棠。不久，涂队长向我提出经济困难，叫我将保里面的自治户捐谷卖去两千斤，把谷款给他们作活动经费。我慎重考虑了一下，然后叫他绕个曲线，先去与当地有实权的绅士涂雅廷（开秀）商

量，促使他来向我开口。这样，我才能手干脚净免至以后的一些麻烦。果然，不日的一天晚上，涂雅廷秘密地、无可奈何地来对我说：“梦岐，现在他们（指涂利培等）成立个什么队，说无经费不能到外面活动，天天窝在我们下围村，日后乡公所知道了……我们这些屋，恐怕要‘放天灯’（放火烧）。我看不如集两千斤户捐谷，把谷款给他们，让他们走开去”。我佯作惊讶状：“以后怎么出数（开支）？”他说：“你就当作交给乡公所的捐谷两千斤嘛。日后还不是我有份算保里的数，你知我知就是了……”

一天晚上，云淡风轻，在闪烁的星光下，我独自一人，在胳膊下挟着沽去二千斤户捐谷的谷款，沿龙船角下游摸黑走小道，将此款送到青龙队的临时驻地——龙船角下游河边的“文昌楼”。在“文昌楼”门口对面的田坎路上，我把款交给队长涂利培。当时，许展棠、许碧（福来）也在一起。涂队长还提出：“枪呢”？言下之意，还要联保自卫队的枪。我说：“让我找机会去了广州你们即可突入去（联保）叫袁长安、涂周两人缴交嘛……”

此后不久，我便借机去了一趟广州。不几天，在广州见到镇仔朱亚吉，他第一句就说：“涂保长，你联保的枪，全部被游击队缴（去）了……”

最近几年与许碧同志（离休干部）谈起我交二千斤户捐谷款给青龙队队长涂利培时，还回忆起当时涂提出：“枪呢”？许碧同志还记忆犹新；涂招同志（离休干部）也还很清楚，说我交给青龙队的一大捆钞票是由他负责管理的（他当时负责青龙队的财经）；缴联保的武装时，他也有份参加；涂福同志（离休干部）也说过，缴联保的枪那天，他是在六里大桥附近的田心寺负责警戒，涂锡鹏同志也在外围指挥。他还说，正缴完枪

时，六里大桥背后的石陂下，来了几十名K军（指国民党的军队）的担架排，我们开了枪并捉到几个没有武装的K军。

六里联保自卫队的武装被游击队缴去之后，队长袁长安当天便跑去广州了。我们三个保长商量后，决定解散自卫队，只留下我认为可以相信的涂心敏、涂周二人为保丁，涂文权为炊事员。那时革命势力正当高潮，镇仔、中村已建立了红色政权，所以对于六里联保的武装被游击队缴去，利龙乡公所的乡长杨兴模、治安委员会主任王影波对我一直没有过问此事。李刚同志也照样来联保与我联系。有一次他听说官渡到有K军，要我派人去了解一下，我即刻派涂心敏去官渡暗访，结果没有此事。

三、营救叶南、阮步革两位同志。大约在1947年10月下旬，翁南联防大队长巫子英由周陂拉营往六里。途经棠梨村时，偶然捕捉了游击队的交通员叶南、阮步革两位同志。他两人是我想方设法通过统战关系而释放的。（详细经过参看《翁源文史资料》第七辑69页“营救叶南、阮步革同志经过”）。

我任六里联保首席保长时，年仅23岁，是“初出茅庐”，没有斗争经验。当革命高潮时，我的心情十分兴奋、激动，充满着胜利在即的喜悦。因此，警惕性方面便略有放松，认为就是我们（共产党）的世界了，而没有预计到会有低潮的一天。

1947年12月，官家骥接任翁源县长。接着，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周济民的440团“进剿”翁源。1948年农历正月中旬，国民党军队“扫荡”镇仔、中村，破坏了那里的红色政权，杀害了朱星平等；下旬又在利龙杀害了李坚（春庭）、彭新映。在白色恐怖笼罩下，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地下党也通知，要我对恶劣形势作好准备。我认真考虑，自认为工作

中没有什么破绽，因而对敌人的突然袭击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几天之后（农历二月初二日），利龙乡公所勾结官家驢的县大队和周济民的440团，同时对六里一带特别是涂屋（现在龙船村）进行大“包围”、“扫荡”。我和几百名群众被捕到利龙。国民党军队对我严刑审讯：吊、打、电烧、钉两手掌，说我是“包（庇）匪”、“纵匪”、“通匪”的保长，给我罗列了一大堆与“匪”字有关的“罪名”。但我没有暴露出地下党的任何秘密。当时，舅父许泽东（翁一中高中部部主任）亲自来利龙对我进行营救。他还来重法室门口见了我，并说：危险是没有了，不过还要解到龙仙去……我在利龙扣押了五天，然后解往龙仙，在县城监狱又关押了近两个月。

我入狱后，三弟梦池在龙仙向各方面进行送礼活动。最后由利龙小学校长王庆贤（他与440团团长周济民是袍泽关系）和在一中任校长的舅父许纬东担保出狱。我出狱后，才知涂寿梅已接任了六里联保的首席保长。

1949年9月中旬，我解放大军攻打龙仙。国民党的联防队，自卫队人纷纷向翁城横石水方面逃窜（当时听说有个叫陈乐夫的人来接翁源县长，已到达翁城以下）。翁北的王炳中逃到六里威胁涂寿梅率该联保自卫队到利龙乡公所，与该乡公所的王影波、阮济材、刘致忠等一同逃遁，有意集中力量作垂死挣扎。至狮子岭时涂认为：1. 没有逃亡经费；2. 自己没有犯对人民不住的罪行，且暗中支持过革命；3. 跟着他们窜只有死路一条，不是善策。因此乘机摆脱王炳中等人，毅然弃暗投明，主动率领全部自卫队人员回到六里，在现在的镇政府门边（当时是荒草地）向人民投诚。那时我是在游击队，又正在六里涂屋活动，便和涂利培、涂呈培、涂初伟、涂慰

棋等负责接收六里联保涂寿梅等的全部武装。当时涂望滋（卫东）、涂世通、涂细文等也协助把枪支弹药运到龙船涂屋村。至此，六里联保土崩瓦解了。

1990年5月

注：十一保是六里镇现在的下陂村，包括圩背、塘唇两处的阮屋；十二保，是现在六里镇的联盟、新跃、华东三个村及六里圩新楼，不包括瓦窑头；十三保，是现在六里龙船村，不包括六里圩新楼。

怀念李醉园先生

黄育辉 杨永鹏

李醉园于1877年出生在翁城西门排寮下李屋。他从小家贫清苦，勤奋好学，思想开朗，上进心较强。由于他聪明好学，在一次应试中考取了秀才。后来，他在翁城开过同益小押铺和做过小生意，还当过坝仔区的粮房管理。民国初年，因世道不安，他搬迁到现在的红岭乡水洞村李姓定居。在抗日战争中，他曾在国民党军队面前，掩护中共翁源地下党一负责人脱险。在解放战争中，他多次热情接待中共地党和游击队的负责人，并积极支持和帮助游击队在山区开展革命活动，为游击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因为当时的斗争是残酷的、复杂的，在斗争中，他家的房屋及财产与群众的一样，也被敌人抢光、烧光，连他老婆也遭敌人无辜杀害。

李醉园先生于1962年病逝。回顾李醉园先生的一生，他有两个方面是值得肯定的：

一是，李醉园于民国初年，由翁城搬家来到水洞，从平原搬到山区，尽管在多方面都有很大差别，但他从不后悔。他当时的想法是，在平原看到旧社会军阀混战，世道不安，搬到山区便于安居乐业。但他搬到水洞后，也碰到了盗贼为患问题。因为水洞接连始兴县境，那时始兴深度水是个贼窝，盗贼经常在边远地区进行拦途打抢，打家劫舍，抢劫财物和青年妇女等，严重影响山区的社会秩序。适逢此时，陈子翼在翁源组成“联团”，自任团总，进剿盗贼。在全县